

DUKU

读库

13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302/张立宪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3-1148-9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3) 第061552号

读库1302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3398809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mm×925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3年4月第一版 2013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148-9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30	西斋十年	沈 迦
31-81	柳河时光	罗 尘
82-138	北京水世界	舒 泥
139-156	穷时候	姜淑梅
157-198	冤狱四则	周 翠
199-213	盗梦哈扎尔	郭建龙
214-267	肉到用时方恨少	小 白
268-279	被背叛的遗嘱	曹利群 庄加逊
280-296	医院	熊 蒨
297-317	风流孟夫子	刘 勃

西斋十年

沈 迦

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它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

——泰戈尔

山西大学堂是山西大学的前身，晚清民初便已成为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可以莫理循为代表，他称赞这是一所完全由英国人主办的“有声誉的学府”。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三所官办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山西大学堂，其实源自一场轰动全球的惊天血案——山西庚子教案。此教案的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国内对义和团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谈到此教案多语焉不详，关于细节，更是无从查考。

笔者近年因撰写赴华传教士、牛津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的传记，曾数度前往英伦查阅教会档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善本书库里，见到一本未见于其他著录的小书《中国

温州，1900》（*Wenchow, China, 1900*）。在这本190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小册子里，竟然有一位叫Yung Cheng（笔者暂译为恽程）的教案亲历者对屠杀细节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是苏慧廉，他当时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会与这场教案的结果紧密相连。

我叫恽程，是浸信会的一员，一年半以前受洗于法尔定牧师。在大屠杀惨剧发生之前，我染疾在身，一直居住在太原府浸信会传教使团基地接受治疗，暇余研习《圣经》。当叶守真医生开办的医院被夷为平地后，我便于6月28日回到了家乡。我从Lou-pu回到城区，7月8号到达太原东南方向十里外的T'ie-ts'un村。大约下午三点，我在路上遇见了来自寿阳的毕翰道牧师，随同的有他夫人和儿子，以及一位绅士鲁教士和另一位女士铎教士，还有两个小女孩。他们被安置在两辆马车里。在一家饭店前，马车停了下来，押送的官兵（我只看见七八位）给他们买了些食物。车上两位先生戴着手铐，毕翰道师母喂给丈夫一些小烧饼和面（一种粗制面条）。鲁教士则自己进食，但只吃了少许烧饼。毕牧师认出了我，并向我打听太原府是否还有牧师。我告诉他，所有牧师都被带往靠近衙门的猪头巷。在别人歇脚休息时，毕牧师和鲁教士却在为身边的人祷告。人们惊奇地问：“你都要因祷告而被杀，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就在那天夜晚，他们七人都被关进县衙。

翌日，在县衙边的街道上，见到一群人围成一堆，于是我也跟上去看个究竟。我发现围在中间的正是一群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还有一些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基督徒。我听围观的人说他们即将被处死。我极力想挤出人群，但怎么也挤不出去，因此也就只能待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外国人遭到杀害。第一个被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妻子紧紧抱着他。他将妻子轻轻推开，然后走到一队士兵面前，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间头落于刽子手刀下。

紧接着遭处死的是胡德理、佩鸿恩两牧师及罗维特医生与卫理森医生，刽子手一一将他们砍首。随后，毓贤显得有点不耐烦，他命令身边护卫，用他们手上的长把大刀一起参与屠杀。随后被斩首的是铎牧师、席牧师和怀德豪。怀德豪命丧一刀，铎牧师和席牧师则挨了好

几刀。男人杀完了，随后便是妇女。法尔定夫人死死抓着自己孩子的手，小孩也紧紧抱着妈妈，但官兵将他们强行拉开，然后一刀向母亲挥去。刽子手很快也处决完所有的小孩，手法可谓娴熟至极，一刀皆准。官兵似乎要显得笨拙不少，其中一些妇女挨了几刀才毙命。罗维特医生的夫人临死仍戴着眼镜，牵着自己的小孩。我依稀记得她对围观人群这样怒吼道：“我们来此皆为传播基督福音，拯救世人。我们从来都行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其中一个官兵取下她的眼镜，随即给了她两刀。

法尔定牧师一家，是本次教案中遇难的最大一个家庭，除夫妇外，还有儿子葛爱、女儿罗思和伊丽莎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尔定夫人紧紧握住的是六只小手。据说时任山西巡抚毓贤极其残忍，当着母亲的面，将孩子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再把女教士处死。

苏慧廉继续写下恫程的见闻：

基督徒遭斩首后，被拉上前的是天主教徒。主教年事已高，胡须皆已斑白，他质问毓贤为何要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我没听见巡抚做出任何回应，而是当即抽出佩剑横着向主教脸部狠狠劈去，鲜血溅满主教斑白的胡须，主教就这样惨遭斩首。随后，神父和修女们也挨个遭处决。

这位被毓贤挥剑斩首的主教叫艾士奇，意大利人，早年即入方济各会。1860年底到达中国，先后在山东、山西传教。1876年华北五省发生大饥荒，作为山西教区副主教，他与后文将要提到的李提摩太一起赈济灾民。艾士奇在天主教徒中有极高的威望，1946年被教宗比约十二世宣为真福，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圣人。与艾士奇同时被斩首的还有副主教富格辣。

之后官兵从紧闭的大牢里牵出毕翰道牧师和他的同伴，毕牧师与鲁教士仍然戴着手镣。毕牧师在临死那一刻仍然在为别人不断祷告。鲁教士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毕牧师夫人临死时牵着儿子的手，不过小孩子也随后被杀。剩下的那位女士和两个小女孩一会儿也被处决。那天总共有五十五名外国人遭斩首，其中三十五名基督徒，余下二十名是罗马天主教徒。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些当地基督徒，我没全见到他



1898年，太原府基督教传教士年会合影，照片上有三十五人，其中二十一人在庚子年殉难。后排左一为法尔定，左三为佩鸿恩，左五为席牧师。第三排左起第四、五位是罗维特医生夫妇，第六位是胡德理，右一是铎牧师，同时遇难的铎师母坐在二排右一。第二排左三为佩鸿恩夫人，幼子诺尔曼偎依身边。佩家满门殉难。

们，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十三名之多。由于屠杀一直延续到傍晚，死难者的尸体因此被遗弃在原地直到第二天清晨。当晚，他们身上的衣物及戒指、手表等被洗劫一空，第二天尸体被移往南门内。

外国人临死时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让我们震惊，遇难者中除了三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哭泣与呐喊。

这一天是1900年7月9日，农历六月十三。计有五十九人遇害，其中基督教（新教）三十三人、天主教二十六人。除太原外，省内各地多有针对洋人及教徒的屠杀发生。山西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

有研究者认为，给毓贤下达杀绝洋人密令的是慈禧太后，只是后来风向大转，太后又密令销毁了庚子拳乱中与她有关的文件，并让毓贤做了替罪羊。慈禧在那一年短短的几个月间，态度发生两次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一是对义和团的态度，从剿到抚；二是对列国的态度，从战到媚。

以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只是名称与说法不一：1900年7月21日，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西狩”，经张家

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出逃前，慈禧已知道后果，她急调已被贬职的李鸿章上京，任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陘，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中国人对李提摩太也许不陌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丁则良撰写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曾行销大江南北。在丁氏笔下，李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今天许多国人的定势思维中，这个形象还没有多大的改观。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南部一个叫卡马郡的地方。作为李氏挚友并为其立传的苏慧廉说他的身上体现了威尔士民族精神：“富有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耶教而又宽宏大量，来自一个乡村小教堂却又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

像很多新教传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出身贫寒。他父母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十五岁那年信仰了基督教，不久后便对海外传教事业发生兴趣。哈弗福德韦斯特神学院毕业后，受英国浸礼会委派，于1869年奔赴中国。之所以选择到中国传教，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

李提摩太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山西大旱，遂转赴太原、晋南赈灾，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李氏初在中国的十余年，也像传统的传教士一样，传扬福音，劝人皈依上帝，但收效甚微。据说他与同事在山西十三年，也仅发展了约三十名教徒。事业的转折发生在1887年，那年他离晋北上从事文字工作，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同文书会任总办，次年该会更名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广学会”。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并出版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在晚清乃至民国，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也是通过李提摩太及《万国公报》第一次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与社会主义。



穿中国服装的李提摩太夫妇。

“马克思”这一译名，即出自他手。

在当时数以千计的西来传教士中，李提摩太暴得大名，与他大力办报、办杂志这些文化传播作为有关。他坚定地认为，是为社会福音，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在其口述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他这样写道：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

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学术界把李提摩太这种传教方法称为“文化传教”，以区别于以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为代表的传统福音传教。传教士由此分为自由派和基要派两大阵营。

经几年文化传教实践后，李提摩太更进一步认为“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感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导上等人入道”。他结交的士绅很广，其中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白银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自荐担任他的中文秘书。

许是因为他的声名，许是与许多高官大吏有交往，面对山西教案造成的困局，清廷想到，能救这盘危局的也许只有这个洋人。接替毓贤出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在给李提摩太的电报中开门见山：“晋人皆信阁下为人正直。”

这是李氏同时代国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同时代的西人也对他充满崇敬。苏慧廉在《李提摩太在中国——先知、政治家、传教士和中国人未曾有过的最无私顾问》一书中说：“在中国，每个省、市、乡、镇的人对李提摩太这名字，都耳熟能详，李提摩太在他们心中是众望所归的。从没有一个来华的外国人、教士、和平信徒的名字，像李提摩太那样为人所知，由位居龙座的皇帝到坐在木凳的乡村学子，都称赞李提摩太的文章，欣赏他对中国的爱心。”英国驻华公使中任期最长的朱迺典在为李氏传记撰写序言时认为：“李提摩太在中国活动长达四十余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这种尊敬的程度只有极少数外国人曾经得到。”曾编撰《中国百科全书》的英国汉学家库寿龄则称赞：“在中国的十八个省中，我们可能找不出一个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人。的确如此，知你最深的人，爱你也最深。”

李提摩太没有辜负众人的期待，1901年5月29日，他将一份解决方案面交李鸿章。这篇题为《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的文章在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中可找到，通读之后，可见李氏的爱心与良苦用心。他语态谦逊，字句间亦无蛮横无理之词。此章程共七条，其中第一、二条这样写道：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为各府起见，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剴切晓谕，使彼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匪首从宽追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有事奉养。

山西被杀外国传教士众多，第五条希望：“耶稣教五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华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

当时处理教案，无外乎赔偿巨款、处理匪首及有责任的官员。但李提摩太认为，传教士生命可贵，非金钱可以抵偿，所以不会以金钱出售他们的生命。他也明白，官府的巨额赔偿一定会转嫁到当地百姓的头上，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仇恨。于是，就赔偿问题，李氏提出如下建议：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

李提摩太提交的这个共赢方案，苏慧廉评价甚高，认为是一个慷慨而伟大的提议，并且只有像李氏这样经验丰富与具远见卓识的人才能提出来，因为“在这个计划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拿掉，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有远见的李鸿章对李提摩太的方案极表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之事交李氏全权负责。不过，并不是人人都有二李的远见与胸襟。即便是向李提摩太发出邀请的岑春煊，也认为“目前山西民穷财尽，拿不

出那么多的银两用以筹备大学”。后来，由于李提摩太自上海“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不得不于1901年9月令洋务局提调候补知州周之钊赴上海面议开办事宜。

周之钊抵达上海后提出的四个谈判条件，看似宏大，却与教育实质无关：一、晋省所出五十万两银不称罚款；二、西籍教师在校内不得宣扬耶教；三、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四、西籍教师不得干预学堂行政。岑春煊特别叮嘱周之钊“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主权”，因此要“极力磋磨”。李提摩太对罚款称什么并不在乎，但坚持认为，如不让西人主持学校，今所办学堂与昔日之书院有何相异？后来周之钊也赞同了这点，他反过来电复岑春煊，称李提摩太并无侵权之意。若无此条，则学堂不能按西方近代模式办理。若不签署合同，恐有商谈破裂之后果。岑春煊考虑到“彼时和议甫成，时局尚未大定，晋省耶稣教案极巨，若与决裂，必致收束为难”，于是“与司道等再四筹商，金以宜委曲求全”。最终，同意周、李所订之合同。岑春煊此时的真实思想是“实以迅了巨案为中心，并非真冀收育才之效也”。

当年11月，周之钊代表山西当局，李提摩太代表基督教山西各教会，正式在《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上签字。合同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五十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提摩太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

合同终于签订了，外国人认为尘埃落定，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仅是一张纸而已。

无独有偶，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清政府颁布“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各省于省城均设大学堂”的上谕。一直担心外人“侵我教育主权”的岑春煊得到这一令箭，便迅速行动起来。他一边叫周之钊在上海谈判，一边在山西本地加紧改造书院，拟抢先一步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与李提摩太要办的中西大学堂，校名虽仅一字之差，但办学模式及教学内容实质差异很大。但山西大学堂的筹备工作进展很快，经皇帝奏准，1902年5月8日（光绪

二十八年四月初一）便可正式开学。

山西本地的这些行动，当时远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并不知晓。当他1902年4月30日带着中外教习一行抵达太原后，才发觉情况严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千方百计反对建立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一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极尽诋毁之能事。”

考虑到同一个城市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中并不可行，李提摩太与岑春煊交涉。

岑春煊说，两所大学可以成为良性的竞争对手，你们外国人不是提倡公平的竞争吗？李提摩太虽然赞成学堂竞争、传教士竞争，但并不赞成一个城市里的大学间竞争。他认为，如开办两所大学堂，既浪费经费，又将使中外不和，而终止中外不和，正是创办中西大学堂的目的所在。为什么不把两者归并为一所山西大学堂，一部专教中学，一部专教西学呢？这种人力的分配更为高效，因为不需要两套教授班子、两套教学设施。

岑春煊觉得“事关创举，未敢率允”。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议，中间还以《合并利弊论》为题询问当时大学堂已招的一百余名学生，结果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反对。苏慧廉在李提摩太传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在谈判的过程中，对立的那方认为自己已经赢得了已录取的学生的支持。于是他们出了个作文题目，让学生们分析联合大学的利弊。结果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在一百零八篇作文中，有六十八篇赞成合并，只有十三篇明确地反对合并。”

商议合并，历时两月之久。双方争议的焦点，仍在传教及教育主权等问题上。最后山西官绅在确定“可无牵涉传教之嫌”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的前提下，终于同意将中西大学堂以成立西学专斋（简称西斋）的形式并入山西大学堂。士绅们觉得他们赢了，因为李提摩太要办的现代大学，最后只成了山西大学堂的一个部分。更重要的是，这所学校还叫山西大学堂。

2008年7月24日，我一早便走入侯家巷，原山西大学堂西斋工科楼至今还屹立在这条地处太原闹市的小巷里。

侯家巷不长，进巷走不了多远，就看见一幢西洋风格的老建筑。大楼由主楼及两侧的翼楼组成。主楼高四层，翼楼高两层。一百年前，它是山西全省标志性的建筑，一百年后，风采依然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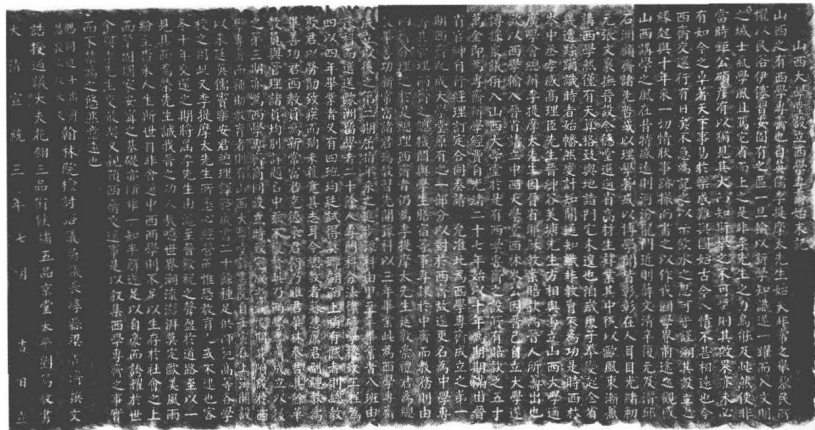
据陪同的当地友人介绍，这幢老楼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全面整修过一次，现在是太原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教学用房。

大门紧锁，好在有熟人带领，得以入内参观。入门即是空旷的大厅，左右各有一宽大的楼梯盘旋而上。我的目光很快落到楼梯转角处的石碑上。嵌于墙上的石碑高约一米、宽约两米，两边各一。这就是记录了山西大学堂早年历程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据说石碑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被水泥抹平，也可能正是因此，逃过了后来的劫难。

西墙上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由时任山西省谘议



至今仍屹立在太原闹市的山西大学堂西斋教学楼。



《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碑文。

局长梁善济亲撰：

山西之有西学专斋也，自英儒李提摩太先生始。夫非常之举，黎民所惧，以民俗伊塞习安固有之区，一旦输以新学知识，遂一跃而入文明之域，士气学风且驾它省而上，之是非李先生之力，乌能及此？然使非当时钜公硕彦有以独见其大，而知斯举之不可□，则其效果亦未必有如今之卓著。天下事易于乐成，难与图始，古今人情不甚相远也。今西斋交还行有日矣，不急为记之，以示饮水思源，可乎？谨溯其设立之缘起，与十年来一切情状事迹，撮而书之，以作我国学界前途之观感。……

东侧的《山西大学堂西学斋教职员题名碑》共刻录西斋教职员工三十六人，其中十五人为外籍，以英国人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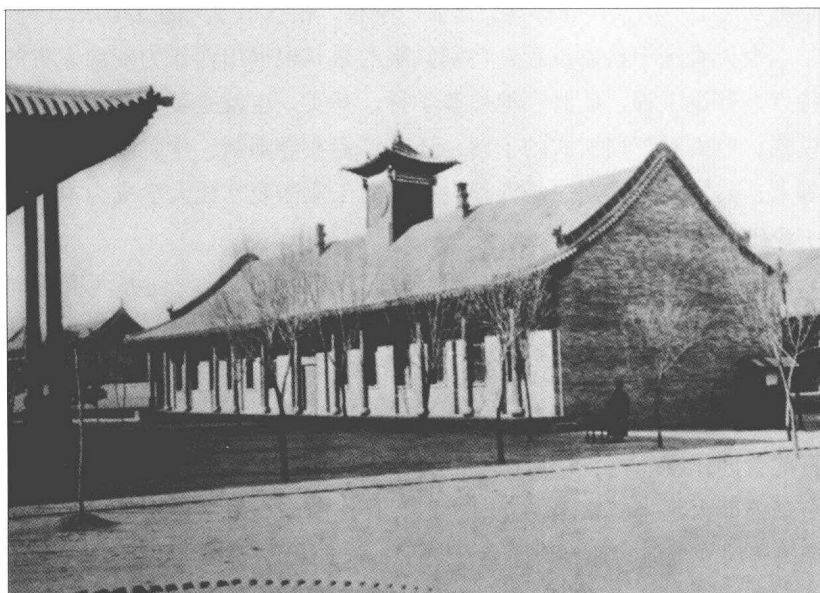
后来查山西大学堂校史才知，这幢工科大楼实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那刚创办时的西斋，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能找到的校园外景照片，是李提摩太传记中的两张插图：一张是大门，有牌楼，还有影壁。牌楼上额写着校训“登崇俊良”。另一张是图书馆和钟楼。据说那时该校已有规模不小的图书馆。当然这些牌楼、图书馆、钟楼，现在都片瓦不存。

西斋当时分预科、专科两个阶段。预科学制三年，相当于现在的高中。专科学制四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本科。预科毕业可升入专



牌楼上额写着“登崇俊良”的校训。山西大学堂是我国近代大学中最早提出特色校训的大学。



山西大学堂的图书馆和钟楼。李提摩太曾将自己的部分藏书捐献给该馆。

科，预科课程的标准就是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水平。

不过这样的学制设计，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丁则良的笔下成为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西学专斋的教务完全由几个外国人决定，教育学生的方针，是要学生毕业后能够升入英国的伦敦大学，并不问学生所学是否符合中国的需要。换句话说，山西大学的西学斋，只不过是伦敦大学的一个预备学校。1907年，有二十五名学生被送到英国去留学。到了1911年，山西大学才全部交还中国自办。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大学，山西大学是第一个。这是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比教会出钱办的大学更能迷惑人们的视线。在山西大学创办之后十年，美帝国主义也如法炮制，把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退还了，办了一个清华大学。”

再看看百年前的功课表：西斋学科分为五门：一曰文学，内分同文史记、地理、师范等学。一曰法律学，内分政治、财政、交涉、公法等学。一曰格致学，内分算学、物理、化学、电学等学。一曰工程学，内分机器、工艺、矿路、地质等学。一曰医学，内分全体内外大小男女居宅卫生及药物等学。这五门学科，相当于今天的五个系。

今天看这个科系设置，特别佩服的是其根据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的特点，开设工程、矿路、地质等学科。其实，这就是英国大学教育的模式。今人对英国模式的了解，还多停留在导师制、学院制、寄宿制等上，其实其精髓之一是课程设置面向工业需要，让大学成为本地区工业研究的重要中心。

西斋所定下的这些科目，明确写在《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第七条。为保证学科建设的稳定，合同第十二条还特别补充规定：“课程无论如何商改，均不得与第七条所列各学科稍有违背，及于此外增立别项名目。倘有违背，或别有增立，可由巡抚立时将此合同作废，并将以后应交之款停交。如晋省官绅违背此合同，可由李提摩太将未交款项，立时全取，移作翻译有用书籍之用。”李提摩太当时在上海，还专为西斋设立译书局。

西斋师资力量很强，外籍教师居多，教师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英语是教学语言。学生除了正常的课程外，还有体操、网球、足